

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

出版前言

只有走过人生广阔领土的人，才有资格谈人生的真谛；只有满怀坦诚的成功者，才会给我们以真实的人生教益；只有亲历过人生苦难的人，才能跳出苦难看人生；只有用理性指导自己人生而又不惮躬耕实践的人，才能讲出人生的理性。展现在读者面前的《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作者在还不到 14 岁的时候，就唱着洗星海的歌儿参加了地下党组织，但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却因为一篇作品，而被打成了右派；一个得到了毛泽东亲自保护的青年作家完全可以因此而解脱，却又举家西迁来到了新疆，在这个自古就是流放罪犯的地方一呆就是 16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位在中国文坛雄风驰骋了半生的人，一夜间又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大臣”。而今，这位虽已年近古稀，但“心儿不曾老”的老人，从《青春万岁》始，在笔耕 48 年写下了一千余万字的文学作品后，又以雄健的笔触、渊博的文化学养、深邃的哲学思想，去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与体悟，去探索揭示人生的大道至

理,这不仅仅是一种写作,而是人生金秋的另一种收获,更是一种人生责任感、社会责任感、历史责任感的履践。

严格说来,作者不是用笔而是用生命、用思辨、用心血在写这本书,且一写就是4年,足见其态度之严谨之认真。更为可贵的是,作者虽然已是誉满天下的著名作家,又有着诸多高高的头衔,但他并不靠这些来吓人,而是以平等的乃至天真的心态在与读者倾心交流,在娓娓而谈中尽管有时也不失往日的激情、激动、激愤,但都在讲述一种自己所思所悟的真实。他绝不放弃人生的哲学睿智与理想境界,但亦绝不高谈阔论,无论小事、大道,都说的是人生至理。一切以生存为基点,以生活为背景,以哲学为武器,用科学与灵动的方法来剖析人生,用实事求是的客观的能动的态度来解析许多人一生中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且颇有新意地创造了许多深刻的人生概念和范畴。因而称其为“人生哲学”是当之无愧的。

本书还收录了作者此前所撰写的有关人生方面的二十几篇随笔精品,列为第十二部分,可为作者该书一贯思想之补充。相信本书的出版一定会为目前充满形形色色人生读物的图书市场,注入一股清新的泉流。希望读者能够从中获取人生的教益,更有效地更健康地投身到伟大的事业与生活中去,得到智慧,得到成熟,得到快乐,也得到成功。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年1月

做一次明朗的航行（代序）

人生好像一只船，世界好像大海。人自身好像是驾船的舵手，历史的倾斜与时代的选择好像时而变化着走向的水流与或大或小的风。

人生又像是一条水流，历史就像是融合了许多许多水流的大江。你无法离开大江，但你又发现大江里布满了礁石，江上或有狂风，江水流着流着会出现急剧的转弯、急剧的下降和攀升，以及歧路和迷宫。

人生又像是一条长路，也许在它快要结束的时候你又发现它其实是那么短。你莫知就里地被抛在了路上。你不可能停下来。于是你蹒跚地走着，你渴望走上坦途，走上峰巅，走进乐园，走进快乐、成功、幸福或者至少是平安的驿站直到理想的家园。然而，你也许终其一生没有得到一天心安。

人与人的命运是怎样的不同啊！这里所说的命运，既包括主观条件即你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的一切特点一切认识和

态度,也包含生存环境,即你所处的时间与空间的坐标,你的有时是无可避免有时则十分偶然的际遇。正像俗语所说的那样,人的能力有大小,人的遭际有偶然即凭运气的可能,人的地位有高低,人的财富有贫富,人的寿命有长短,人的体格有强弱,人的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有优劣、美丑、公正与极不公正之分。人比人气死人,人比人该有多少不平、多少愤懑、多少怨毒和痛苦!

痛苦也罢,怨毒也罢,只要还活着,谁不希望自己的命运能更好些,更更好些呢?谁不愿意知道并且实行自己对自己命运的积极影响乃至把命运之舵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呢?

有时你又觉得人生像是一个摸彩的游戏,别人常常是幸运者,他们摸到了天生超常的禀赋与资质、优越的家庭背景、天上掉下来的机会以及来自四面八方的援助之手,而你摸到的可能只是才质平庸或怀才不遇、零起点、误解、冤屈和来自四面八方的嫉妒、打击乃至阴谋和陷害。

作为一个年近七旬的写过点文字也见过点世面的正在老去的人,我能给你们一点忠告、一点经验、一点建议吗?

也许谈不到什么经验和忠告,但我至少可以抱一点希望、一点意愿,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生活得明朗一些。明朗,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成就有大小,际遇有顺逆,但能不能生活得更坦然、更清爽、更光明、更健康也更快乐一点?只要一点。

作为写过小说也写过诗的人,我知道各种对于愤怒、忧愁、痛苦、矛盾、疯狂乃至自毁自弃自戕自尽的宣扬与赞美。我熟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愤怒出诗人”、“知识分子的使命是批判”、“智慧的痛苦”、“痛苦使人升华”、“我以我血荐轩辕”、“生老病死”、“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

狱未空誓不成佛”以及“文章憎命达”、“从来才命两相妨”之类的名言。我无意提倡乃至教授廉价的近于白痴式的奉命快乐。我所说的快乐、健康、坦然、清爽与光明，不是简单地做到如老子所说的“复归于婴儿”，而是另一种超越，另一种飞跃，另一种人生境界：是承担一切忧患与痛苦之后的清明；是历尽至少是遭遇一切坎坷和艰险的踏实；是不仅仅能够咀嚼而且能够消化的对于一切人生苦难的承受与面对一切人生困厄的自信；是把一切责任一切使命一切批判和奋斗视为日常生活的平常平淡平凡；是九死而未悔、百折而不挠的视险如归，赴难如归，水里火里如履平地；是背得起十字架也放得下自怨自艾自恋自怜的怪圈的大气；是不单单拥有智慧的煎熬和困惑的痛苦，而且拥有智慧的澄澈与分明的欢喜，从而是更包容更深了一层的智慧；是大雅若俗大洋若土大不凡如常人，从而与一切浮躁，与一切大言哄哄乃至欺世盗名，与一切神经兮兮的自私、小气的装腔作势远离开来。

驾驶着你的人生之船，做一次明朗的航行吧。

驾驶着你的人生之船，使你的航行更加明朗一些吧。

让智慧和光明，让光明的智慧与智慧的光明永远陪伴着人的生活吧。

永远与智慧和光明为伍，永远与愚昧和阴暗脱离，这是可能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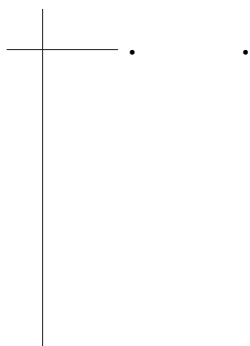
这就是本书所要讨论的。

王 蒙

2002年8月于北戴河

一 生存与学习

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一个是生存，一个是学习。没有生存之虞的人生是没有代表性的人生，因而我们不能笼统地咒骂人欲横流。牺牲有时是必要的，但生存的权利是第一位的人权，是不可剥夺的。我们必须珍惜个体的生命价值，但生存并不是简单地活着。你所做的事在决定着自已生存的价值和质量，而这里学习是最重要的。本章结合自身的经历来谈学习对于人的生存、对于生活的重要性；人应该怎样在学习中通达人生享受人生；以及我在新疆 16 年的苦难经历。



王
蒙
自
述
·
我
的
人
生
哲
学

“生命如屋 ”

编辑小姐要我写一本类似人生感悟的书，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对于我来说，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那构成了我人生的主要内容的活动是什么？

当然，谈人生首先要谈人的维持生存，一切为维持生存而做的劳动、工作、奋斗都是正当的，是不应该回避和无视的。相反，一个人从来不为生存而操心操劳，从生下来就是吃着现成饭，穿着现成衣，住着现成房，然后吃饱了喝足了为人生的终极意义而发表高论——这样的高论恐怕是靠不住的，至少是极特殊的没有多少普遍意义的。因为他或她的这种生活方式是不那么自然的，它没有代表性，没有或较少有参考价值。他可能成为天才，成为一代宗师，成为怪异，成为聊备一格的或一鸣惊人的风景；也可能或者说是更可能成为不可救药的空谈家，成为自大狂，成为准精神疾患者。

我自 1958 年多次下乡劳动，这样的劳动给我最大的感悟就是要关注生存问题，要关注粮食、蔬菜、居室、穿衣、燃料、工具、医药、交通、照明、取暖、婚姻、生育、丧葬、环境……诸种问题。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首先关注的正是自己的与亲人的、同乡的、同胞的生存问题，愈是发达国家的人愈是如此。在一个

相对安定的社会里，一个普通人最关心的是取得一份好的工作，是购买属于自己的房屋和汽车，是财产保险和医疗保险，是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在美国，有的人从年轻劳动到死甚至还没有缴够分期付款的房屋，就是说他们倾其一生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这很正常也很正当。我看过一个美国电影，影片的名字叫《生命如屋》(life as a house)。讲的是一个癌症患者在他生命的最后四个月以疯狂的热情拆毁和重建了他的房子，临终遗言说，他的生命已保存在他的屋中。

就是说，不要轻信那些漠视人的生存问题，捏着鼻子蔑称之为“形而下”的纨绔子弟的牛皮大言。一切不关心人们的生存条件生存质量的理论，都带几分云端空论、大而无当的可疑之处。

就是说，你为生存而从事的工作、劳动、事由，你为之花去的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是值得的、甜蜜的与健康的，至少是正当正常正派的。你的快乐虽然不仅限于生存本身，但也就在生存中而不是仅仅在生存以外。宋儒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而且人欲要彻底地灭，这是混账至极的学说。天理就在人欲中，人欲并不限于极度地消费，也表现为贡献与节制自身。人欲中既有生理的欲望也有精神的高层次的欲望。印度圣雄甘地提倡的简朴的生活与高深的思维，不能说就不是人的欲望。人欲中有着理性与自我调节自我控制的因素。至少人欲可以升华为理性和智慧。人欲可能有恶性泛滥的危险，它需要调节、引导、控制，但这种引导和控制并不视人欲为敌。很简单，没有自我调节与控制，人类就不能很好地生存；而没有生存的欲望，没有改善生存的欲望，也就发展不起理性和智慧。毕竟人的欲望不仅是肠胃与生殖器直到四肢的欲望，也

包含了大脑和心灵的欲望。

笼统地咒骂人欲横流，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解决温饱问题才不久，或者一部分人尚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地方，给人一种宋儒或者邪教教主的感觉。而只限于感官欲望的满足，又未免给人以停留在动物阶段的感觉。

珍惜个体的生存权利与生命价值

这样，你就会与多数普通人找到共同语言，你就不会轻率地否定旁人抹杀旁人，你就不会动辄暴露自己的虚妄狂躁凶恶愚蠢的人性恶，你就会调准自己在人群中的位置，你就会踏踏实实地生活在地面上。

这样，你还会具备一个远远不够但却是起码的符合健全理性的是非标准，你可能仍然掌握不了真理，但你至少不会轻易上当，因为你懂得了一点点常识：有利于改善人的生存境遇的一切思想理论见解有可能是正确的，虽然未必是足够的即理想的。而一切从总体上就不叫人生存，不叫人好好地活着，剥夺人的生存权利生存质量的胡说八道却令人不屑一顾，不论它打出什么样的伟大旗号。这当然并不是排斥在特殊情势下个体为了集体为了国家民族所做出的牺牲，这些牺牲也应该是明明白白的，它们是为了群体的生存而不是为了灭亡而做出的，不是为了牺牲而牺牲，不是为了炫耀，不是为了教义，不是为了冲动而牺牲，更不能强迫旁人为了一己认定的价值而牺牲。多数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好的理念是和生存一致而

不是相悖的。

例如一些邪教,不是把注意力放在怎样好好地活上而是放在为教主为教义而死而自戕自毁上,甚至自己死了还不成,还要毁灭多少生命来证明或逼近某个邪教的预言,这种敌视生命蔑视人类的生存权利的所谓信仰无论如何不是个好信仰。

例如当一个人为的灾难终于过去,人们不敢去谴责灾难的制造者,不去认真地汲取历史教训避免类似的灾难再次发生,而是群起责问幸存者:你为什么活下来了?活下来成为一些人永远的耻辱,成为叫他们抬不起头来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样的质问也许义正词严,然而毕竟只有自身活着的人才可能发出这种谴责,这使我们不能不对之进行分析和掂量。因为生存权毕竟是第一位的人权,而一般情况下,活着的人责备另一个人的活着,似乎不必那么高高在上。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智取威虎山》里的一个情节,座山雕最最不能容忍被俘过的手下,因此栾平不敢说出他被“共军”杨子荣审讯过的事实,终于被我侦察员杨子荣处决。在前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叶尔绍夫兄弟》中也有一个人物,因了被俘而不是战死而永远抬不起头来,甚至他的情人也因此宁愿长期住在集体宿舍而不想与他结婚。这样的事例是不是代表一种正确的思路,值得我们画一个问号。至于英勇就义,慷慨赴死,古今中外这样的英烈都是有的,他们在特殊情况与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做出的英勇表现,当然永远是我们的榜样。而在个体的生存的牺牲与叛变之间作出的选择,应当是前者,这也毫无疑问。特别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信念、组织、同志和朋友为代价的苟活,我们并不怀疑它的可耻。

我的人生主线

生存是不能漠视的首要问题，却又是最初步的问题。如今，在一个基本上满足了温饱要求的国家，这又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所以，人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满足于活着与为活着而活着。那么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生存下来以后，这一辈子你主要做了些什么？活着，总要干点事。往往不仅是你的活，而更重要的是你所干的事决定了你的价值，也决定了你的活的质量。人们要问的是你是怎么活下来的？就是说，在你存活之际，你主要从事了些什么活动呢？

以我为例，我很容易回答为：写作。也可以回答：革命工作。但有没有比它们更一贯更从未停止过中断过的活动呢？有没有伴我一生，成为贯穿我的生活的自始至终的内容，成为我一生的一条主线的东西呢？

有，那就是学习。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从不停歇，从来没有被怀疑过其价值和意义，从来都给我以鼓舞和力量，给我以尊严和自信，给我以快乐和满足，从来都给我以无尽的益处的行为，就是两个字——学习。

学习最明朗，学习最坦然，学习最快乐，学习最健康，学习最清爽，学习最充实。特别是在逆境中，在几乎是什么事都做不成的条件下，学习是我的性命所系，是我的能够战胜一切风浪而不被风浪吞噬的救生圈。学习是我的依托，学习是我的火把，学习是我的营养钵也是我的抗体。学习使我不悲观、不绝望、不疯狂、不灰溜溜也不堕落，而且不虚度年华（这一点

最难),不哭天抹泪,不怨天尤人,不无可奈何,不无所事事而且多半不会为人所制。

不会被人剥夺的事情就是学习,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

我为什么没有自杀?

王
蒙
自
述
：
我
的
人
生
哲
学

某种情况下,我甚至要说,恰恰是在身处逆境之时,学习的条件最好,心最专,效果最好。顺境时人容易浮躁,周围常常会有各种朋友、跟随者、慕名者、请教者;顺境时你常常忙于说话、写字、发表意见、教授旁人、好为人师;顺境时常常自我感觉良好,志得意满,看到的是旁人的失缺;顺境时你必须满足社会与众人对你的期待,你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去做旁人要你做的事情,比如出席某些活动、仪式而目的仅仅是为了表示你确已出席。而逆境时、被晾到一边时、“不可接触”时、“不准革命时”,正是不受干扰地求学的良机、深思的良机、总结经验教训的良机,是严格地清醒地审视自己反省自身解剖自身的良机,是补充自己、壮大自身、使自身成长、使自身更新的良机,是学大知识、获大本领、得大彻大悟的最好契机。

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我身在新疆维吾尔民族聚居的农村,又处在极“左”的狂热之时,由于我在当时被错误地列入另册,不能写作,不能在任何单位上班工作,也不能正常参加社会活动……当然无法有任何作为,甚至看来似乎也没有办法光明正大地学习。我便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农村干部群众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上。怎么样学习毛主席著作呢?学维吾尔文版的。我用维吾尔语背诵下了老三篇,背诵下了一大批毛主席

语录。一次我大声朗读《纪念白求恩》，房东老大娘甚至以为是广播电台的播音。这说明我读得是怎样的字正腔圆一丝不苟。

有些外国朋友不理解我怎么可能在那种条件下在新疆一口气生活了16年，没有发疯也没有自杀。他们询问我在新疆16年做了些什么，言外之意那么长的时间，你的生活将会是怎样地空虚和痛苦。我半开玩笑地回答说：“我是读维吾尔语的博士后啊，两年预科，五年本科，三年硕士研究生，三年博士研究生，再有三年博士后，不是整整16年吗？”

任何表述都不是面面俱到的，我无意用这样的说法来掩盖我与很多同命运的其中有不少是优秀的人士在那个年代的经历的悲剧性，也无意提倡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然而我以为确有真正的精神真正的胜利，不是仅仅用一种类似儿子打老子的谰语欺骗与麻醉自己，而善于在一切逆境中学习，通过学习发展和壮大自己，憧憬着准备着未来，为最后的不仅是精神的而且是全面的胜利打下基础。这样的学习同时也是对于制造苦难制造不义嫉贤妒能不动欲置人于死地的坏人的最好回答。

至于为什么没有疯狂也没有自杀，当然还因为我的“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我的对于生活对于人众（例如维吾尔农民）的爱，还由于正是我自己从童年和少年就选择了革命，包括革命的曲折和艰难，是我自己选择的，它并不完全是外来的与异己的强加的灾难，这样思考就会舒服一点，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就会强一些。有一些激烈的评者总是责备我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采取对历史和现状无情的决绝态度，对不起了，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的起点、出发点、思考的角度就是有所不同，我不

打算迎合。我也不喜欢那些欺世盗名的大言。

多几种生存与创造的“武器”

从这里便要说到学习语言的问题。谈到学习,没有比学习语言更重要的了。多学一种语言,不仅是多打开一扇窗子,多一种获取知识的桥梁,而且是多一个世界,多一个头脑,多一重生命。

至少在我们国家,有一种或多种拒绝学习语言的理论或说词。年轻的时候,我的一位极好学的朋友曾经对我讲述了他不学习外语的“理由”,他说学外语太费时间,而他太忙碌;他说时代的发展趋势是翻译愈来愈发达和及时,因此他不如坐待翻译的帮助,而把宝贵的时间用到别处去。

然而,他应该明白通过翻译交流和学习与直接从原文交流和学习,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思想、感情、人类的一切知性悟性感性活动直至神经反射都与语言密不可分,思想的最最精微的部分,感情的最最深邃的部分,学理的最最精彩的部分与顿悟的最最奥秘的部分都与原文紧密联系在一起。让我们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不要说中文译西文或西文译中文了,让我们试着把老子的《道德经》译成白话文吧,让我们试着把唐诗宋词译成当代粤语吧,它能够传达出多少原文的神韵与精微?

再有大量事例已经证明,翻译是带着理解和解释的翻译,而愈是要害问题上,翻译愈是受自己即翻译者本人的历史、地域、处境与知识结构乃至个性的局限,愈是重要的命题和精彩

的作品愈是要不断地翻译,不断地修正翻译,不断地在理解上从而在翻译上出新。一个确实希望有所作为有所发现发明创造的学人,哪有只满足于让翻译牵着鼻子走的道理?

有一种故意夸大其词的听起来很吓人也很荒谬的说法,但也并非完全是无稽之谈,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切问题其实都是来自翻译,例如我们把 democracy 译作民主,把 dictatorship 译成专政,这都不甚对。人们望本国之文而生发外来词之意,这就产生了无数麻烦。再如众所周知的列宁的名著《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近二十余年来则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并从而在解释上有宽与严乃至极“左”与非极“左”的区别。这些对于不懂原文的人来说,只能任翻译、任懂该种语言的人牵着鼻子走。一个希望学习追求真理的人,一个希望有所贡献有所创造的人,能够允许自己始终处在这样被动的局面吗?

还有一种最最奇怪最最愚昧的说法,似乎不学外语是爱国的表现。他们说:“我是中国人,学外语做什么?”瞧,积极学外语的人有不想再做中国人之嫌呢。“文革”当中倒是有这样的以无知为荣的事儿,谁如果是“老粗”,没上过几年学,那反而是政治上可靠的标志。真是可耻呀!难道祖国希望于她的儿女们是封闭和无知的吗?这样的胡说八道我连评论他们的兴趣都没有了。

有人说自己的中文太好了,或者太热爱母语中文了,所以不想学或学也学不好外语,这也是荒谬的。外语与母语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只有比较过母语与外语的人才能真正认识自身的母语的全部特点,才能从比较中得到启示得到联想,从而大大扩张与深化对于母语并且对于外